

纳粹德国下的「认信教会」 (1933—1945)

作者：郭燕欢（中国神学研究院道学硕士二年级）

[繁体 PDF 档下载](#) | [简体 PDF 档下载](#)
[版权声明](#)

（一）引言

1933 至 1945 年间，对德国福音教会来说，是一个充满试炼与挑战的时期。纳粹主义的极权统治政策，入侵德国每一角落。正当德国教会陷入希特拉的操控危机时，一群追求教会与信仰自由的基督徒，从极端的国家与民族主义中挣扎出来，形成「认信教会」。本文尝试叙述纳粹德国下的「认信教会」之诞生过程、所面对的内忧外患，以及面对各种当代挑战时的回应。

（二）背景

1. 独裁统治的序幕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大受重挫，国民对当权的「威玛共和」（Weimar Republic）失去信心。与此同时，纳粹党领袖希特拉标榜民族及国家主义，撩起德国人民的国族情绪，赢得大部分爱国德人支持。1933 年 1 月，政治强人希特拉正式上台，象征德国进入纳粹极权统治的时代。为了巩固纳粹政权的势力，确保德国人民完全效忠政府，希特拉企图操控国内的大小团体机构，使之逐一受制于政权之下。¹

2. 「德国基督教」的成立—教会沦为政治工具

三十年代初，德国境内许多基督徒受强烈的民族意识熏陶，对希特拉的当权充满期望。希特拉早年更扬言要团结德国的基督教会，并建立「正面的基督教」（positive Christianity），博得不少基督徒支持。因此，当时「德国福音教会」（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）内洋溢一片拥护纳粹政权的呼声。² 早于 1932 年，一群亲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基督徒已成立「福音基督教」（Evangelical Nazis）党派；³ 后来在希特拉推波助澜下，正式改名「德国基

¹ Victoria J.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 (New York: Oxford Univ Press, 1992), 30.

² Douglas S.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*Journal of Theology for Southern Africa* 47:1 (June 1984), 13.

³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32.

「德国基督教」(German Christians)，在全国教会议会中，迅速取得三分之一议席，⁴ 成为日后希特拉统一及操控全国基督教团体的政治工具。

3. 国家主教改选风暴

1933 年 4 月，在希特拉的支持下，「德国基督教」主张德国教会通过订立新宪法，同意成立「国家教会」，并选出新国家主教，统一全国 28 个地区教会 (Landeskirchen)。⁵ 1933 年 5 月的地区教会会议中，德高望重的 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以 91 票对 8 票，击败「德国基督教」的候选人 Ludwig Müller，顺利成为新任国家主教。选举会议后，大批牧师被革职、拘捕，von Bodelschwingh 也被逼请辞。同年 7 月，德国教会议会大选前夕，希特拉在广播中公开支持「德国基督教」；而整个选举过程，更在纳粹士兵的严密监察下进行。结果，「德国基督教」以三分之二票数胜出，取得大多数议席，国家教会大权旁落。⁶ 这正标志着德国教会逐步落入纳粹政府手中。⁷

(三) 「认信教会」的诞生

「德国基督教」成为希特拉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傀儡，大力鼓吹建立「亚利安基督教」。他们主张德意志是上帝新拣选的民族；而希特拉则是德国的弥赛亚，也是上帝拯救德国的启示。⁸ 当时，好些基督徒对「德国基督教」的信仰教义及宗教政策深感不满，遂集结成一股宗教性的抗议力量，形成日后所谓的「认信教会」群体。

1. 「牧师紧急联盟」(Pastors' Emergency League)

1933 年 9 月的「褐色会议」(Brown Synod)⁹ 正式确立 Müller 成为国家主教；同时，国家教会通过「亚利安条款」(Aryan Paragraph)，排斥任何拥有「非亚利安」血统的牧职人员。

「亚利安条款」正式颁布后，Dahlem 的 Martin Niemöller 等随即组织「牧师紧急联盟」，呼吁全国牧师联合反对「亚利安条款」执行，同时宣认只忠于圣经及「宗教改革」传统的认信；¹⁰ 约有一千多位不满「德国基督教」的牧师立即响应加入。到了 1933 年底，「牧师紧急联盟」的成员更超过六千

⁴ Klaus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 (London: SCM Press/ Philadelphia: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, 1989), 98.

⁵ 参 James H. Nichols, *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650—1950* (New York: Ronald Press, 1956), 386;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15;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00.

⁶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33—34.

⁷ Kenneth C. Barnes, "Protestant Social Thought and the Nazi State, 1933—1937," *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* 29 (1987):47.

⁸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14.

⁹ 因大部分出席会议的人，皆穿着褐色纳粹制服而得名。参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34.

¹⁰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01.

人。¹¹ 他们一方面反对「亚利安条款」，同时致力在经济上救助受「亚利安条款」影响的犹太血统牧师。「牧师紧急联盟」可说是认信教会的先声。1934年，「牧师紧急联盟」更成为认信教会的核心分子。

2. 部分教会如梦初醒

1933年11月的「运动场集会」(Sportspalast rally)上，约二万名「德国基督教」的支持者，鼓吹「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结合」，主张扬弃《旧约圣经》、否定保罗神学，并高举「亚利安条款」等。¹²

「运动场集会」发生后，数以百计基督徒如梦初醒，陆续离开「德国基督教」。¹³ 神学家卡尔·巴特 (Karl Barth) 更力斥「德国基督教」是异端。¹⁴ 后来，希特拉委任纳粹官员 August Jäger 执掌全国教会事务，促使更多教会领袖意识到，纳粹政府对基督教会的狼子野心。三间路德宗的地区教会 (包括 Hannover、Württemberg 及 Bavaria)，遂表示脱离国家教会的管治。¹⁵ 同时，德国境内不少牧师及信徒，纷纷对政府干预教会的措施感到不满。这群与国家教会对立的分离分子遂集结在一起，共同承认及坚守唯一的神学及信仰教义，并与「德国基督教」划清界线，形成所谓的「认信教会」。

3. 〈巴门宣言〉 (Barmen Declaration)

1934年5月中旬，卡尔·巴特与另外两位神学家，在法兰克福草拟一份神学共同认信宣言。于同月31日的「巴门会议」(Barmen Synod)上，这份宣言由139位来自18间认信教会的代表¹⁶通过采纳，成为认信教会的重要神学依据，称之为〈巴门宣言〉。¹⁷

〈巴门宣言〉强调教会只能效忠基督，其中内容包括以下六项：¹⁸

引用《约翰福音》14章6节及10章1、9节，表明「基督藉圣经向我们启示，祂是上帝唯一的道；我们无论生或死，都要听从、相信及顺服祂」。宣称拒绝接受「德国基督教」所传的「虚假教义」：

「否定在上帝的话语之上与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事迹、权力、人物与道理，可以成为上帝的启示」；

¹¹参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18-19;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35.

¹²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15-16.

¹³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48.

¹⁴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18.

¹⁵她们被称为「不动教会」(intact church)。另参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48.

¹⁶包括路德宗、改革宗及联合派等的「德国福音教会」。参 Peter Matheson,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 (Edinburgh: T&T Clark, 1981), 46.

¹⁷ Bax, "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: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," 19-20.

¹⁸参 Matheson,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45-47;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54; 及 Robert M. Brown, "1984: Orwell and Barmen," *Christian Century* 101(August 1984): 770-71.

「否定我们的生命有些地方是不属于基督的，而属于其他主人或范畴，当中我们不必靠祂得救和成圣」；

「否定教会可以容许将其信息的形式与其教制，移交给任何它所愿意的对象，或是现行这世代变迁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」；

「否定国家有权超越其特殊任命，而使自己履行教会的使命，成为人类生活的唯一及完全权威」。

声明「德国福音教会的永恒不变基石，是建基于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福音藉圣经向我们启示，并在改革认信运动中，得到重新确立」；同时指摘当时的国家教会机构「已偏离这永恒不变的基石，并且违背了无数律法与宪法；因此，不配作德国福音教会的元首」。

1934年6月，牧师 Karl Immer 把〈巴门宣言〉（附载他的「巴门会议」记录）印制成小册子，销量达二万五千本。〈巴门宣言〉随即传遍整个德国，¹⁹ 成为认信教会与「德国基督教」抗争的重要教义依据。

随着〈巴门宣言〉的广泛传播，加入认信教会的牧师及信徒数目急速增加；即使在一些受「德国基督教」高度管制的国家教会中，也能发现有少数的「认信基督徒」存在。1934年1月，超过七千名牧师加入「牧师紧急联盟」（约占全国牧师人数37%）。²⁰ 但总体来说，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，仍属于少数群体。

随着1934年10月「德国基督教」大势已去，²¹ 认信教会与「德国基督教」的对立局面逐渐缓和。然而，自1935年开始，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仍饱经内忧外患。除了要面对纳粹政府的苦苦相逼，认信教会还要承受内部分裂而带来的沉重压力。

（四）「认信教会」的内忧—内部分裂

严格来说，认信教会的产生，是基于宗教信仰理由。〈巴门宣言〉见证了他们在对抗「德国基督教」的信仰立场上团结一致。然而，当他们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敌人，已从宗教层面转移到政治层面的时候，政治立场上的分歧，驱使认信教会内部走向分裂。

1. 「温和派」与「激进派」

¹⁹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56.

²⁰ Klaus Scholder, "The Churches and the Third Reich," *The Year of Disillusionment: 1934 Barmen and Rome*, Vol.2 (London: SCM Press), 22.

²¹随着纳粹政权日趋稳固，「德国基督教」已失去利用价值，希特拉遂表明不再插手德国教会事务；而 Jäger 因拘捕两名路德宗主教的事件惊动外国干预，也要引咎辞职。「德国基督教」失去纳粹政府的重大靠山，Müller 的国家主教地位遂变得有名无实。参上文，页 64—65。

以三间路德宗教会（常被称为「不动教会」（*intact church*））为首的「温和派」，²²属于认信教会的绝大多数。他们承认纳粹的政权正统合法，主张教会要顺服地上的政治权柄；对于纳粹政府的极权措施，他们倾向采取妥协、容忍的让步态度，避免与政府产生冲突。相反，以 Niemöller 为代表的极少数「激进派」，则反对纳粹政府的极权统治，主张教会应站出来伸张公义，与不义的政府抗争到底；同时又要向在压逼中的受害者施以援手。²³

两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，导致纳粹统治下的认信教会，长期保持内部对峙的局面。正如 Niemöller 在 1936 年所言：「真正的分野，不在我们与『德国基督教』之间，而在我们与那些中立派之间。」²⁴而下列历史事件，便足以反映两派因政治立场不同，而造成的分裂与离心。

2. 分裂的先声

1934 年 1 月 25 日，Niemöller 与三位「不动教会」的主教 Meiser、Wurm 及 Marahrens 会晤希特拉，要求他撤销两条新颁布的宗教政策。²⁵三位主教期望透过与政府官员打交道，以和平谈判解决国家与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。然而，在会议上秘密警察（*Gestapo*）播放了一段 Niemöller 的电话录音，表明「牧师紧急联盟」的活动受政府监视，并暗示认信教会的领袖，正被列入政府的黑名单内。三位主教遂迁怒于 Niemöller，指摘他的反政府言行，连累整个认信教会。²⁶

会议后一星期，三位主教企图修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，旋即与 Müller 会面，并签署声明，同意「无条件向国家及统治者效忠，也支持国家主教」。这次事件后，认信教会的内部对立与矛盾更为激烈。一方面，「激进派」的教会，轻蔑「温和派」主教向强权俯首称臣；而另一方面，「温和派」的教会则把责任推在「激进派」身上，指摘他们的行为惹来政府向教会施压。此事以后，计有一千八百多名「不动教会」的牧师离开「牧师紧急联盟」，以示抗议。²⁷

至于 1934 年 5 月的「巴门会议」，纵然两位「不动教会」的主教 Meiser 及 Wurm 也有出席，并投票通过〈巴门宣言〉；可是他们并没有批准〈巴门

²²三间路德宗的「不动教会」，就是指先前脱离国家教会管制的 Hannover、Württemberg 及 Bavaria 教会。

²³参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06;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49–50, 70; Glenn T. Miller, *The Modern Church: From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to the Eve of the Third Millennium* (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97), 267–68; 及 Donald D. Wall, “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” *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* 23 (1981):16–17.

²⁴转引自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63.

²⁵1933 年 12 月，政府下令教会停止一切青少年聚会，并转送他们参加纳粹青少年组织；1934 年 1 月，Jäger 颁布「关于恢复德国福音教会的秩序条文」，藉此加强政府对教会的控制。详参上书，页 50。

²⁶“Hitler Receives the Protestant Church Leaders, 25 January 1934,”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ed. Peter Matheson. (Edinburgh: T.&T. Clark, 1981), 42–44.

²⁷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51–52.

宣言) 在其教会中宣讲。²⁸ 这大概因为两位主教担心触怒纳粹政府, 而不敢公开承认〈巴门宣言〉的立场。「温和派」教会对纳粹政府的「敬畏」、让步态度, 由此可见一斑。

3. 分裂导火线

1935 年初, 认信教会成立「临时教会政府」(Provisional Church Government)²⁹, 由 Hannover 的主教 Marahrens 领导。作为「温和派」的 Marahrens, 极希望「临时教会政府」能取得纳粹政府的认可, 成为管理国家教会的合法机关。然而, 纳粹政府却委任一名纳粹官员 Hans Kerrl 统管全国教会事务, 并成立「国家教会委员会」(Reich Church Committee)。此事以后, Marahrens 企图疏通「临时教会政府」与「国家教会委员会」的关系, 引起认信教会内许多「激进派」的不满。³⁰

1936 年 2 月于 Oeynhausen 召开的第四次认信教会会议中, 强势的「激进派」大力谴责「不动教会」向政府让步、妥协的政策, 三间路德宗「不动教会」愤然退出「临时教会政府」。³¹ 此事以后, 好些认信基督徒不满「不动教会」的「亲政府」立场, 遂开始对「不动教会」离心。认信教会内弥漫着一片散乱、分裂的气氛。

及至 1936 年 5 月, 一封由十位「激进派」牧师联名、批评纳粹极权手段的「给希特拉信简」(Hitler's Memo) 被公开后, 惹来「秘密警察」对认信教会的大规模逼害。「温和派」的教会为求自保, 立即公开抨击「激进派」的反政府行为不当,³² 藉以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关。两派的分裂局面愈见明显。

1938 年, 希特拉入侵捷克, 三位「临时教会政府」的「激进派」领袖, 撰写并发表一份「祷告礼仪文」(Prayer Liturgy), 一方面为战争与和平代祷, 同时也为德国人民悔罪。三位「激进派」领袖被纳粹政府定为叛国, 「不动教会」的三位主教立即与三位「激进派」领袖划清界线, 并公开批评「祷告礼仪文」的内容欠缺爱国情操。³³

总括而言, 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, 由于内部对纳粹政权各抱不同态度, 因此他们在回应当代政治与社会问题上, 无法团结一致。³⁴ 虽然「不动教会」

²⁸同上书, 页 57。

²⁹或称 “the Reich Council of Brethren”, 见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06。

³⁰同上书, 页 104-106。

³¹从此, 「临时教会政府」便完全落入「激进派」认信教会手中。参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69。

³²Wall, “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” 17。

³³同上文, 页 19; Matheson, ed.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76-79;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89-90。

³⁴直至 1941 年二次大战期间, 「不动教会」的主教 Wurm 才呼吁认信教会必须团结一致。结果「温和派」及「激进派」的代表一路德宗及弟兄会(Councils of Brethren), 在 1943 年的会议上, 共同制订十三条「教会任务与服侍声明」(Task and Service of the Church), 始标志认信教会团结抗敌。参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20-21。

表示自己站在认信教会的立场；然而，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态度，却备受「激进派」教会的批评。³⁵ 而当「温和派」教会追求与纳粹政权保持和谐、合作的关系时，对于「激进派」的公开抗争及反政府行为，他们都必然加以指摘及反对。

1935 年开始，认信教会与纳粹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。但是，受政府逼害最严重的，始终是「激进派」教会的牧师及信徒；而一直主张与政府合作的「温和派」教会，所受的压逼则相对很少。

（五）「认信教会」的外患—纳粹逼害

不少认信教会的领袖一直认为，他们的反抗出于宗教立场，与政治无关。³⁶ 无可否认，1934 年的〈巴门宣言〉，是一项信仰与神学的宣认。然而，〈巴门宣言〉所强调的是，教会在任何立场上，只能忠于基督，当中并无任何妥协余地。换言之，当认信教会「向基督说『是』，便是意味着向希特拉说『不』。」³⁷ 故此，对希特拉来说，认信教会（特别是「激进派」）就是一群反抗纳粹政权的叛徒，是阻碍极权统治扩张的绊脚石。

因此，当 1934 年〈巴门宣言〉在全国地方教会广泛散播，随即引起纳粹政府的关注，「秘密警察」对认信教会的压逼日渐增多。³⁸

1. 「秘密警察」（Gestapo）的逼害

1934 年春，「秘密警察」在 Mecklenburg 拘捕了七名牧师，并把他们收监。这是纳粹政府向认信教会发出的威逼警告，同时，也揭开了政府逼害认信教会的序幕。1935 年开始，许多认信教会的活动，被逼改为地下进行。当时，认信教会受纳粹政府的严密监察，教会一切聚会或活动，都必须向「秘密警察」登记；而大部分聚会，也有一位「秘密警察」从旁记录整个聚会过程。而在一些「德国基督教」势强的教区内，认信教会牧师举行聚会，则只能在个别的信徒家中秘密进行。³⁹

根据一位当时带领研经班的老师忆述：「1934 年，我是研经班的老师.....当时《旧约圣经》被定为『犹太书籍』，但我们仍然如常授课.....后来被一位政府官员发现.....我收到一封『秘密警察』寄来的警告信，指我被定为『政治上不可靠的』人物。」⁴⁰ 由此可见，当时认信教会的聚会内容，也受到「秘密警察」的严密监察。

³⁵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69.

³⁶即使「激进派」的领袖 Niemöller，也曾表明「牧师紧急联盟」仅在宗教立场上进行反抗，当中并无涉及任何政治动机。参上文，页 57。

³⁷ Brown: “1984: Orwell and Barmen,” 771.

³⁸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56—57.

³⁹同上书，页 63—64，77—78。

⁴⁰摘自 Barnett, “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Reflecting on Germany’s Confessing Church,” 514。

此外，纳粹政府对认信教会的青少年工作尤其敏感，故其监控措施也特别严谨。认信教会举办任何青少年活动，都必须数月前向「秘密警察」申请，并要详细交待参加者的资料（包括是否「希特拉青少年」（Hitler Youth）的成员）；待获得「秘密警察」的批准后方可进行。一旦被「秘密警察」发现认信教会非法进行青少年活动，所有参加者除了要接受「秘密警察」的盘问外，还有可能被跟踪或入屋搜查。「秘密警察」的严厉监察措施，除了削弱青少年参加教会活动的意愿，同时更大大打击教会青少年工作者的信心，实在令认信教会的青少年工作举步维艰。⁴¹而实际上，自 1933 年开始，许多教会也只能为青少年举办研经班，此外其他一切青少年活动都被「秘密警察」禁止。⁴²

当时认信教会的牧师，大部分都在「秘密警察」的严密监视下生活。⁴³按 Heinrich Schmidt（当时在认信教会「临时教会政府」中充当消息传递员）描述：「他们不得离开自己的城市……家中的电话被安装了监听器、所有信件都被人拆开。」⁴⁴可见，认信教会领袖的通讯往来完全断绝；幸而有些热心委身的信徒，甘愿冒险充当他们中间的消息传递员。⁴⁵

当时，许多认信教会领袖的言论自由，亦受到「秘密警察」严重压制。例如 1935 年 3 月，认信教会的牧师 Heinrich Vogel 写了一篇反对极权国家的声明后，七百位读过这篇声明的牧师，以及 Vogel 本人随即被「秘密警察」拘捕。⁴⁶1936 年 5 月，十位「临时教会政府」的成员，共同草拟一封「给希特拉的信简」；内容针对希特拉及其纳粹政权，并批评政府逼害犹太人的政策。此信被公开后，惹来纳粹政府的强烈反感；有关人等被「秘密警察」追捕，在未经法院审讯及定罪的情况下，随即押送入集中营。⁴⁷

2. 「希门拉法令」（Himmler Decree）的执行

1937 年 8 月，政府正式颁布「希门拉法令」，规定所有认信教会的神学院均属非法组织，勒令立即关闭；其神学考试亦属违法，不受法律认可。⁴⁸此法令一执行，大批年青牧师及神学生受到影响。他们的神学资格，一概不受法律及国家教会的认可，因而沦为「非法」牧师。他们在不同地点秘密进行「非法聚会」，没有经济及法律保障之余，还常被「秘密警察」监视、盘问。⁴⁹

⁴¹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78–80.

⁴² Barnett, "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Reflecting on Germany's Confessing Church," 516.

⁴³ "The Gestapo and the Churches, 12 November 1934 & 6 May 1935,." Matheson, ed.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51–52.

⁴⁴ 转引自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63–64.

⁴⁵ 同上书，页 85。

⁴⁶ 同上文，页 80。

⁴⁷ "Protest of the Provisional Leadership to Hitler, 28 May 1936," Matheson, ed.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58–62; Barnett, "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Reflecting on Germany's Confessing Church," 515–16;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83–85.

⁴⁸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87.

⁴⁹ 1935 年 10 月，一名年轻的认信教会牧师被纳粹党员殴打，警察却没有拘捕那班暴徒。同上书，页 82–83。

多间认信教会的神学院，在「希门拉法令」执行期间，仍然继续秘密运作。例如柏林的认信教会神学院（*Kirchliche Hochschule*），便一直授课及举办神学考试，直至 1941 年 5 月被「秘密警察」查封为止；当中 23 名参与「非法」考试的教师及神学生被捕入狱。⁵⁰

1936 年底，认信教会的「代祷名单」中，受「秘密警察」逼害人名，除了牧师，还有平信徒。据 1938 年官方统计，受「秘密警察」逼害的认信基督徒已达四千多人。⁵¹ 由此可见，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，受政府逼迫的认信教会人数，实在难以想象。

（六）面对时代的挑战—「认信教会」的回应

1934 年发表的〈巴门宣言〉，成为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的重要信条。然而，它主要关注的，始终是神学教义上的澄清与确立；至于当时黑暗极权政治，对社会与人民造成的种种伤害，则未有提及。此外，由于认信教会内大多数领袖都是「温和派」；他们对政府态度倾向妥协。加上受到「秘密警察」的沉重压逼，使许多认信教会领袖宁愿保持沉默；而当中只有少数牧师及信徒，敢于向当权者公开对抗。

因此，在纳粹政府施行「安乐死」措施，以及向犹太人进行大逼害期间，认信教会仍然保持一片沉默、被动；直至第二次大战将近结束，认信教会才能痛定思痛，猛然醒悟过来。

1. 「安乐死」大屠杀

i. 哀钟的响起……

希特拉鼓吹种族单纯，大力提倡「优生学」的科学理论，以培养优良纯正的亚利安血统。1933 年 7 月，政府通过法例，强逼「次等」国民⁵² 绝育。据统计，期间约有廿至卅五万人，因而被逼绝育。⁵³

1939 年初，希特拉秘密授权成立专责部门，筹备大规模的「安乐死」行动，企图去除国内一切不优良的人种。是年春天，20 位政府官员及医护人员，选了六间机构作为施行安乐死的基地，并陆续装置毒气室及焚化炉等设施。当运送病人往安乐死中心的巴士也准备就绪，大规模的屠杀即告展开。1939 年 8 月，「婴孩安乐死」的计划展开，约有五千名婴孩因而死亡。⁵⁴

1939 年 9 月，安乐死的噩梦迅速蔓延至全国病院、疗养院及残障中心。二次大战爆发，希特拉下令全国院舍必须填写「表格」，申报每个院友的病

⁵⁰同上书，页 93。

⁵¹同上书，页 99。

⁵²「次等」国民，指一切先天缺陷的人，包括癫痫、聋哑、弱能等。同上书，页 105。

⁵³同上书，页 104—105。

⁵⁴同上书，页 106。

历，以协助政府有效调配医疗资源。⁵⁵ 结果，数以万计的病人被送往安乐死中心，接受毒气屠杀。根据一位曾在安乐死中心工作的人忆述，毒气室内平均每 20 分钟杀死一批病人。⁵⁶

ii. 认信教会的反应

由于绝大多数安乐死受害者，都是来自教会辖下的院舍；安乐死计划迅即引起教会关注。⁵⁷ 1940 年，两位具影响力的教会机构领袖 Fritz von Bodelschwingh 及 Paul Braune，先后去信政府、游说官员，指出安乐死计划不合道德、且没有法律依据，应立即终止。可惜 von Bodelschwingh 对政府的态度温和，甚至倾向妥协。在 von Bodelschwingh 的影响下，认信教会为免影响他的斡旋工作，也不敢向政府提出公开抗议。⁵⁸

1940 年 7 月，Braune 因去信谴责政府的安乐死计划，而被捕入狱。⁵⁹ 此后，仍有好些教会领袖（例如 Württemberg 的主教 Wurm）去信政府，表达他们对安乐死计划的怀疑和不满；但他们得到的，都一概是官方式的答复。⁶⁰

认信教会对安乐死的犹疑、被动态度，不但未能及时阻止安乐死的蔓延，且令政府在施行安乐死时提高警觉。直至 1940 年 10 月，认信教会在 Leipzig 会议上，才正视安乐死事件的严重性，可惜一切来得太迟。截至 1940 年底，全国已有三万五千多名病人，被逼接受了安乐死。Menninghüffen 的牧师 Ernest Wilm 立即公开痛斥教会在安乐死事件上的沉默：「你们知道，却闭口不言」。⁶¹ 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在认信教会中仍有个别「激进派」的牧师（包括 Wilm），敢于公开抗议政府以安乐死为屠杀病人的借口；他们结果被「秘密警察」拘捕，送往集中营去。⁶²

直至 1941 年 8 月，一位耿直的天主教主教 Clemens Graf von Galem，在教堂公开宣讲政府的安乐死计划，并按「刑事法第 211 条」控告纳粹政府屠杀病人。⁶³ 他的讲章被广泛印发，引起全国内外关注，逼使希特拉「书面上」立法停止安乐死计划。但事实上，安乐死依然存在。纳粹政府只不过改变了施行安乐死的形式，延长病人的死亡时间而已。据统计，当时每天仍有一万多人被逼接受安乐死；而 1942 年，安乐死的病人还有三万多名。故此，安乐死的大屠杀行动，实际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才真正告一段落。⁶⁴

⁵⁵ Matheson, ed.,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85–86.

⁵⁶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06–107.

⁵⁷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18.

⁵⁸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10–14.

⁵⁹ Matheson, ed.,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84–88.

⁶⁰ 官员为要隐瞒希特拉乃安乐死计划之幕后主脑，都一致以「军事机密」为理由，委婉回复。见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14.

⁶¹ 转引自上书，页 119。

⁶² 同上书，页 114–16, 179。

⁶³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19.

⁶⁴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17–21.

对于「安乐死」这个道德问题，许多认信教会领袖的态度保持被动。他们认为「为免更多病人受害，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惹怒政府」。⁶⁵ 1943 年 10 月的第十二次会议上，认信教会终于正式公开谴责政府的安乐死措施，是草菅人命的行为；并且为过去教会的沉默而公开悔罪。⁶⁶ 然而，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生命经已断送，试问又怎能挽回呢？

2. 犹太人大逼害

i. 「反闪族」(anti-Semitics) 情绪高涨

二十年代开始，德国境内的犹太人，掌握了德国的商业经济命脉。面对当时政治衰弱、社会经济不稳，德国人民纷纷迁怒于犹太人，指摘他们操控了德国的社会经济；社会上蕴酿着一股「反闪族」的民族情绪。受「基督教与犹太教对立」的宗教思想影响，不少认信教会牧师及信徒，在宗教上也认同「反闪族主义」。因此，在希特拉积极推行各项「反犹太人」的高压政策时，大部分认信教会的立场一直暧昧——既没有公开抗议，也没有向受害者施以援手。

ii. 认信教会的反应

纳粹统治期间，立法通过的种族条例共有二千多条，其中不少是针对教会内的犹太基督徒的。例如在 1933 年「亚利安条款」实施后，所有带犹太血统的人，都被定为「非亚利安」人，被政府褫夺公民权；许多带犹太血统的牧师被教会革职，受影响的犹太基督徒更高达五十万人。⁶⁷ 后来，纳粹政府又立例禁止教会为犹太人施洗，1941 年更禁止基督徒与犹太人接触。

1935 至 1936 年间，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逼害愈见增加；然而，绝大多数的认信教会，对政府的反犹太人政策，态度一直保持中立、沉默。例如 1935 年，Bavarian 的主教 Meiser 便警告，「不要把犹太人的问题，列入认信教会的会议议程中」。⁶⁸ 当时教会领袖的沉默，引起不少信徒不满。例如 1935 年，柏林教区的职员 Marga Meusel 写信控诉认信教会对犹太人的问题坐视不理；可惜，当时教会内的「中立」声音太多，Meusel 的言论，得不到教会领袖支持。⁶⁹

面对政治与信仰立场的种种冲突，例如在教会应否接纳犹太基督徒的问题上，认信教会大部分领袖都没有表明立场，反把责任推在地区教会身上，由他们自行决定接受犹太基督徒与否。因此，当时好些抗议宣言，都是来自个别地

⁶⁵同上书，页 119。

⁶⁶ Matheson, ed., "The Final Solution, 17 October 1943,"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98-99 及 Wall, "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" 29-31。

⁶⁷ 1935 年通过的 Nuremberg Law, 更把「非亚利安」人划分为「纯犹太人」、「半犹太人」及「四分之一犹太人」，受牵连的人数随即迅速上升。据统计，1933 年的「纯犹太人」约五十多万、「半犹太人」有廿万、「四分之一犹太人」有十万。参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27-28。

⁶⁸转引自上书，页 129。

⁶⁹同上书，页 130。

区教会的。例如 1942 年 9 月，Brandenburg 地区教会声明：「驱逐非亚利安裔基督徒离开教会，就是违背圣经教义及教会的认信宣言。」⁷⁰

1938 年 11 月 9 日晚，「反闪族」情绪高涨的德国群众，在纳粹政府的煽动下，肆意打破犹太人的住家、商店、会堂的门窗，并以残暴对待犹太人；然而，警察则只站在一旁观看。其后，二万名犹太人（当中包括四位牧师）被捕、送往集中营。这次暴动事件，充分揭示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逼害。然而，许多认信教会领袖，对于这次事件仍抱中立态度；例如「不动教会」的 Wurm 曾去信政府提出抗议，但信中却表明：「对于政府视犹太教为威胁而加以打击，本人没有意见。」⁷¹ 至于少数敢于指摘政府暴行的牧师，则遭受严重逼害。例如 Württemberg 的牧师 Julius von Jan 在讲道中指摘纳粹党员的暴行，结果事后被一群暴徒袭击，后来还被捕下狱。⁷²

iii. 个别的「地下」英雄

当大部分教会领袖保持沉默之际，幸而还有个别教区的牧师和基督徒（主要在柏林）敢于伸张正义，站出来向纳粹政府反抗，私底下向犹太人施以援手。

1938 年 9 月，在柏林成立的「格鲁伯办公室」（Grüber Office）便是其中一个营救受压逼犹太人的「非法」组织。⁷³ 他们主要工作是协助犹太人离开德国；⁷⁴ 后来政府限制犹太人出境，⁷⁵ 「格鲁伯办公室」便开始为犹太人伪造护照、粮食券等，又替他们安排匿藏地方，为犹太儿童设立「家庭学校」。1940 年 12 月，「格鲁伯办公室」被「秘密警察」查封，格鲁伯牧师及其他同工被送往集中营。⁷⁶

当时还有其他的地下组织，如「Kaufmann Group」⁷⁷ 及 Württemberg 的「协会」（“Society”）⁷⁸，秘密为犹太人伪造身份文件、护照及粮食券等，并收集「多产妇女勋章」⁷⁹，派发予有需要的犹太人。此外，还有好些热心的认信基督徒，为犹太人举办「入集中营前的预备班」。他们以「查经小组」为名，在犹太人家中聚会，一方面训练他们在集中营里布道、主领圣餐；同时又一起祷告、读经，藉此分担他们所受的痛苦，让他们得着一点安慰。⁸⁰ 纳粹政

⁷⁰ “The Jewish Christian,” 见 Matheson, ed.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82—83.

⁷¹ 转引自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42.

⁷² 同上书。

⁷³ 「格鲁伯办公室」在柏林约有 35 名同工，另有 26 名支援员分布全国。参上文，页 145。

⁷⁴ 截至 1939 年 8 月，「格鲁伯办公室」合共协助了一千多位犹太人离开德国。同上书。

⁷⁵ 参 Werner Weinberg, “Why I Did Not Leave Nazi Germany in Time,” *Christian Century* 99 (April 1982): 480—81.

⁷⁶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44—146.

⁷⁷ 得到卡尔·巴特在国外的经济支持，Franz Kaufmann 遂与 Helene Jacobs 及 Gertrud Staewen 等，共同组织救援犹太人的地下网络。参上书，页 150。

⁷⁸ 这是由一班 Württemberg 的牧师自行组织的支援犹太人团体。参上书，页 149—50。

⁷⁹ 「多产妇女勋章」是纳粹政府颁发给多产的亚利安妇女，以表扬她们为国家生育优秀的亚利安后代；因此，这是荣誉的象征。参上书，页 76。

⁸⁰ 同上书，页 146—48。

府逼害犹太人期间，这类救援犹太人的地下组织此起彼落；可惜到最后，这些组织都难逃被「秘密警察」查封的厄运，许多组织成员更被送往集中营去。⁸¹

在纳粹德国下，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数以百万计。此外，在惶恐战栗、孤立无援的困境下，自行了结生命的犹太人，数目更是多不胜数。⁸² 面对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重重逼害，正如 Kaufmann 所说：「难道我们可以继续视若无睹地生活下去吗？」⁸³ 1943 年 10 月，认信教会的领袖终于在会议上，对纳粹政府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作出公开指摘。⁸⁴

3. 第二次世界大战

i. 〈效忠宣言〉的矛盾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大量认信教会牧师及信徒被征入伍。许多被「秘密警察」逮捕的「非法牧师」被送到前线抗敌；例如 1941 年夏天，300 个 Rhineland 教区的「非法牧师」中，已有 270 个被押到前线去。⁸⁵ 然而，也有好些牧师及信徒，是自愿入伍的。他们一方面本着爱国情怀，尽上国家义务；同时亦希望借着参军，能重建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。⁸⁶

当时，许多参战的牧师及信徒，都面对着爱国与信仰的矛盾。身为一个德国人，他们有责任效忠及保护国家；但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他们又不能顺从地上不道德的权柄。而〈效忠宣言〉：「我谨向德国国家及德意志民族领袖（Führer）——希特拉尽忠及顺服」，便更把问题的张力扩大。因为当一个认信基督徒宣告效忠希特拉，便是违背〈巴门宣言〉只效忠基督的承诺。尽管「激进派」反对，大部分「温和派」的认信教会仍坚持〈效忠宣言〉只是一个表示爱国的宣言而已，与信仰毫无冲突。面对〈效忠宣言〉与〈巴门宣言〉的两难抉择，不少参战的基督徒所持的立场是：「我们是为国家而战，不是为希特拉而战」。⁸⁷

ii. 战争：公义与不义

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，德人民族意识高涨。当时不少认信教会领袖，都提倡「为国家及领袖祷告」。⁸⁸ 例如三位「不动教会」的领袖，曾发电报给希特拉表示：「我们愿意为国家领袖、军队及所有效忠德国的人民，献上

⁸¹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19.

⁸² 据 Jochen Klepper 忆述，单在 1942 年的柏林，平均每天有 20 至 30 名犹太人，因孤立无援而自杀。转引自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42.

⁸³ 转引自上书，页 154。

⁸⁴ Matheson, ed., "The Final Solution, 17 October 1943,"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98–99; 及 Wall, "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" 29–31.

⁸⁵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95.

⁸⁶ 这是因为认信教会一直被政府定为「非法」组织；信徒被褫夺公权之外，还受尽社会歧视、欺压。参 Wall, "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" 22.

⁸⁷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56–57.

⁸⁸ 参 "The Outbreak of War, 2 September 1939," Matheson, ed.,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83–84.

最大的祷告力量」；1940年春，「临时教会政府」也发表「公开祷文」（Public Prayer），指引信徒「为国家元首、政府及士兵祷告」。⁸⁹此外，不少认信基督徒（包括一些反纳粹的「激进派」信徒），本着爱国精神，也支持德国出战。例如，当时被关在集中营的「激进派」领袖 Niemöller，表示自己已作好准备，为德国海军效力。⁹⁰

虽然当时认信教会内，也有不少信徒反对希特拉的侵略行为；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承认德国发动的战争，是一场不义之战。而认信教会的领袖，对于德国发动战争的公义与不义，也一直没有表明立场。例如他们主张为国家及领袖祷告，但祷文中却从不祈求德国胜利，也没有表明德国出师有名。在民族情感与信仰道德的张力下，德国的开战到底是「公义」还是「不义」，这个挣扎一直萦绕着每个德国认信基督徒的心。1939年秋，「激进派」的 Peter Brunner 及 P. Walter Spitta 分别发表文章，指出：「我们都不能绝对肯定，这是一场不义之战；因此，基督徒理应服从政府的主权。」⁹¹

直至二次大战后期，希特拉的侵略野心已原形毕露，加上德军的败势渐现；认信教会内的反战声音相继增加。1943年，Württemberg 的主教 Wurm 去信政府，谴责希特拉发动侵略战争，陷德国人民于不义与痛苦之中。⁹²但与此同时，仍有一些「爱国」的教会领袖，继续支持德国开战。例如 1944年，以 Hannover 主教 Marahrens 为首的教会领袖们，竟发电报给希特拉，表示支持德国侵略俄国。⁹³由此可见，认信教会领袖对德国开战的立场，仍然各有分歧。

但无论如何，随着二次大战渐入尾声，德国败局已定。德国认信教会最终痛定思痛，于 1943年 10月举行的第十二次会议上，公开抗议希特拉发动不义之战；同时又承认过去「认信教会」在一切「不义之事」上的沉默，并且为此悔罪。⁹⁴这次会议，可算为纳粹德国下的「认信教会」来个总结。

（七）总结及反省

回顾 1933至 1945年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。起初，一群为宗教自由、信仰真理而抗争的基督徒，共同宣读〈巴门宣言〉，承认耶稣基督乃教会独一之主；并承诺在一切立场上，教会只能忠于基督，没有任何妥协余地。然而，当面对纳粹政府的重重压逼，许多认信教会领袖为了顾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，竟选择向政府让步、在政治上妥协；对于政府的「多行不义」、社会上的不道德现象，教会更是沉默不言。幸而，当时还有好些敢于伸张正义的认信基督徒，

⁸⁹转引自 Wall, "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" 20、24。

⁹⁰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17.

⁹¹ Wall, "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" 21—22.

⁹²参"War Atrocities, 28 January 1943," 见 Matheson, ed.,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97—98。

⁹³ Barnett, *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: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*, 172—73; Scholder, *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*, 117.

⁹⁴ Wall, "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," 29—31; Matheson, ed. "The Final Solution, 17 October 1943," *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*, 98—99.

勇于跟政府对抗、救助受逼害的人；他们的正义行为，为认信教会的历史添上一点光彩。

毕竟，宗教与政治、教会与国家，都是不能二分的。只要教会仍然置身于历史中，它便有必要从时代的冲击中，不断确立自身的定位与角色。作为「时代的先知」，教会站在上帝与国家之间，是世上的光；对于国家政府的不义行为，教会怎能视若无睹？另一方面，教会作为「基督的代表」，是世上的盐；面对社会上受害者的哀号，教会又岂可独善其身呢？

然而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平衡？教会要顺服「地上的权柄」到哪一个程度？教会抗议政府的行动之合理性又应如何界定？这些都是历久弥新的问题；也是当我们评价纳粹德国下的「认信教会」之功过时，必先深思熟虑的问题。最后，笔者援引神学家潘霍华的一番话，也许藉此能给予我们对这个问题多一点启发：

「教会是国家的中心，教会也是国家（与上帝之间）的界线……教会不管自己是处高贵还是处卑贱，都应当一如既往地只仰望降卑的基督……教会只有在谦卑地自己认罪，请求饶恕并承认上主的时候，她所行的方称良善。教会必须每天从基督那里领会上帝的旨意，她能领受上帝的旨意，全靠已然成为人的、降卑的和升高者的今在。」⁹⁵

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(OCCR)版权所有©2004

OCCR 鸣谢文章原作者及中国神学研究院学生会允许在网上发表本文。原文刊于中国神学研究院《神学生论文集》（2004年5月）。

读者可免费下载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，唯必须全文下载，包括本版权声明，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。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

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introduction/citationandcopyrights.htm>。

本文网址 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_0096.htm

OCCR 网址 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>

[繁体 PDF 档下载](#) | [简体 PDF 档下载](#)

⁹⁵朋霍费尔 (D. Bonhoeffer)：《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》，王彤、朱雁冰译（香港：道风，2001），页 49、107。